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增订版

夏春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增订版

夏春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夏春涛著. —增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3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22277-6

I. ①天… II. ①夏… III. ①太平天国革命-宗教-研究②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IV. ①B929. 2②K254.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6614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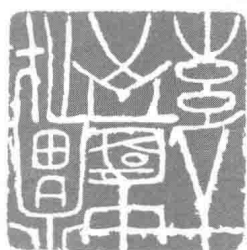
夏春涛 著

Tianguo de Yunl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1.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4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一

夏春涛研究员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即将出版了。这是他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我为他高兴。

这本书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春涛很有理由地称之为“上帝教”，做了细致充分的研究。它考察了洪秀全创建上帝教的过程，上帝教的教义、经典、仪式、节日，上帝教在太平军中和在民间的传播，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及与中国旧有民间宗教的关系，同时又研究了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这就将太平天国宗教的正反诸方面都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显示出视野的宽广和研究的深度。

这本新书之所以以“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为副题，我想是由于他过去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过一本获得好评的《太平天国宗教》，而现在这本书则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宗教方面研究太平天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困难的，那时有一种没有规定的规定——似乎像农民战争那样的伟大事业，与愚昧欺人的宗教是不应有什么联系的。当然事实不是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邵循正先生写过论文，论证在中国和在世界历史上两者间的关系，以及很多次农民战争有宗教色彩和内容的事实。我在七八十年代写过若干篇论文，讨论和研究太平天国的宗教，编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但并没有对太平天国宗教做总体全面的研究。春涛的这部著作完成了弥补这一缺陷和遗憾的任务。它所考察的上帝教本身的诸方面，以及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及中国民间宗教的关系和异同，洪仁玕后期参加太平天国后修订上帝教教义的尝试和努力，这些有关太平天国宗教本身的问题，在书中都有较充分的阐述。

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与太平天国的政治密切相关的。本书很好地



把握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地就宗教论宗教，而是透过宗教对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对宗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失败的关系，都做了相应的连带研究，有较充分较深入的论述。所以，这本书实际上超过了它的书名所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太平天国全部主要历史的著作。这体现了本书的广度和深度。我相信，本书对太平天国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将是一个贡献。

王庆成

2005年10月于美国密歇根州



序 二

1992年，夏生春涛刊行《太平天国宗教》一书，我为作序。十三年后，春涛又刊行《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得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喜而再为之序。既嘉春涛之劳绩，也欲借此篇幅一罄自己对太平天国史学继续获得发展的心愿。

从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第一代学者兴起太平天国史研究。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罗尔纲等，披荆斩棘，开辟了这一学术新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时势推动下，太平天国史学人才辈出，著述如林，盛极一时。旋遭“十年浩劫”，太平天国史研究虽遭受惨重摧残，但因根柢结实，故能从70年代末起，衰而复振，推出了诸多成果。其中有一代大师罗先生的毕生心血，也胪列着后继诸贤的丰功伟绩。然而随着罗先生逝世，第二代学者也零落将尽，加以时异境迁，学风蜕变，有志于治太平天国史的中青年已寥若晨星。而春涛独能不随波俯仰，二十年苦守此专业如一日，斐然成章，可谓难得！

还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春涛来扬州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所著《太平天国服饰考》、《吟唻〈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史料探源》等，皆精湛。已而到北京，登太平天国史大家王君庆成之门，攻读博士学位，见闻益广，日进千里。春涛能继王君志事，着重探讨洪、杨等农民领袖假托“拜上帝”发动群众反封建反侵略起义的得失。此书即在王君指导下，长时绩学的结晶，多言前人所未及言。其详当由庆成兄论之。

为了促进太平天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在这里，我愿与广大中青年学子共温一代硕学罗尔纲先生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笃信乾嘉考据学，并把它革新和改进，施之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考据或称考证，是我国研究已往事物的传统方法。人们研究自然靠实验，研究人类社会现状靠调查，研究人类历史靠考据。其术如法官治狱，调查取证，比较归纳，对照条例，判别是非。考据萌芽于先秦。两汉以后，广泛使用于说经考史。南北宋时，考据始有专书，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朱熹的《韩文考异》，都是考据的杰作。只有读过《通鉴考异》，学者才能深知司马氏撰《资治通鉴》，对史料的取宏用精，严于取舍，去伪存真。考据大盛于清。顾炎武、江永等考先秦古音；阎若璩、惠栋等辨东晋本古文《尚书》为伪作；戴震等校《水经注》，分清积久混淆的经注；钱大昕、王鸣盛等校订历代正史的讹误；崔述著《考信录》，辨古史真伪；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理清古文字形、义、音的联系及其变化；王念孙、引之父子考经传虚字，明三古辞气，等等，都靠考据。清代学者最尊学贯天地、人的通儒，而其起点乃是“实事求是”，所谓“通儒之学自实事求是始”。梁启超尝谓若无考证，则无清学。章炳麟则谓清代没有不懂考证的经师。这些都是笃论。由于乾隆、嘉庆之际是清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以“乾嘉考据”代表清学。

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惠栋、戴震等“隆汉贬宋”，绝非出于对不同时代学派的爱憎，而是出于对不同方法论的抉择。惠、戴学派反对宋人“凿空”说经，“凭胸臆以为断”；主张必由汉经师训诂以明孔孟义理，重视征实。这不是复古，而是在古学外衣下的学术创新。刘师培最早说，乾嘉考据接近西方科学。而真正能够说明东西方治学方法相通并吸取西方科学革新乾嘉考据的，则是民国年间从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归国的胡适。

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催生了实验主义哲学。它不相信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是真理还是谬误，必须通过实验来判别。它相信一切事物都是进化的。实验主义认为，困惑是思维的起点；假设和选择假设是解决困惑的重要步骤；必须得到确凿证据，才能肯定或者推翻原来的假设，做出结论。胡适把这种思维方法概括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把它对照乾嘉考据学，发现很多是暗合的。但因清儒是不自觉的，所以，有时限于取证不足，而把假设当做了结论。经过胡适等的改革，我国的考据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进步，完全成为科学。最早直接受胡适教导，把改进过的考据学应用到太平天国史研究，得到空前巨大收获的，就是罗尔纲先生。



考据学的首要工作是取证。清乾隆年间，邵晋涵撰《尔雅正义》，他预计“取证差少三年”。由于对某些问题取证不足，乾嘉诸老所作结论也往往被后人所否定。如戴震在《毛郑诗考正》中斷言，《毛诗》传本里有些“讯”字，毛、郑都解释为告，当是“谇”字之讹。“谇”，读若瘁，训告；“讯”，读若信，训问，音义都不相同。但随着取证的深入，戴门弟子王念孙发现先秦古音“讯”读如瘁，与“谇”同音，因此在经传中二字大量通用，既有以“讯”作告意解，也有以“谇”作问意解，并非错字。于是王氏的《广雅疏证》推翻了戴氏的假设，“或以讯为谇之讹，失之”。历史学的取证，就是搜集史料。如众所知，对此，罗先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造了图书馆摸底等方法，收集到一千数百万字太平天国史料。这种取证功夫，正是对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考据学的又一重要工作，是审查所获得的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内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师，但也有相信伪证的疏失。如《日知录》卷二十“年月朔日子”条，举《文选》所辑魏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与《南史·刘之遴传》所载“古本《汉书》”为证，不知此二件都出自后世伪托，前者经凌廷堪辨明，后者经邵晋涵考定。罗先生为辨别史料真伪，考证记载异同，也耗费了巨大心血。他所撰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洪大全考》、《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都是启发一代学者的考据名篇。

只有深入取证，严密审证，然后才能把近真的史事归纳起来，产生《太平天国史》巨著，为后生撰写信史奠定基础。这就是罗先生的不朽业绩。近百年来，一人而已。

我衷心祝愿将有更多的中青年志士，与春涛一起，勇于绍承罗先生等老一辈的光辉事业，把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更高峰，为伟大祖国做出贡献。

祁龙威

2005年9月序

时年八十四岁

目 录

引 言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概述	1
第一章 上帝教的创建	8
第一节 洪秀全：从屡试不第到皈依上帝	8
第二节 上帝降临广西：上帝教的问世	18
第三节 “八面烧起，起不复息”：金田起义的爆发 ——兼论上帝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的融合	29
第二章 上帝教教义	44
第一节 “上帝”	44
第二节 “魔鬼”	64
第三节 “天堂”“地狱”	80
第四节 教义综述	87
第三章 上帝教经典	91
第一节 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	91
第二节 《旧约》《前约》《真约》	107
第四章 上帝教礼仪和节日	143
第一节 洗礼仪式	143
第二节 七日礼拜仪式	147
第三节 天历六节	155
第五章 上帝教的传播	162
第一节 上帝教在太平军中的传播	162
第二节 上帝教在民间的传播 ——以移风易俗政策为主线的考察	176
第六章 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	221
第一节 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	221
第二节 洪仁玕修订上帝教教义的尝试	239

第七章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内外政策	259
第一节 “天下一家”理论与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	259
第二节 独尊上帝与太平天国的反孔政策	273
第三节 同为“兄弟姐妹”的理念与太平天国的 妇女政策	287
第八章 天国的陨落与陨落的天国	303
第一节 大同社会的理论构想与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	303
第二节 兄弟倾轧 自隳长城	312
第三节 吏治流弊 动摇根基	328
第四节 天国的陨落	341
结束语 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	362
附录一 太平天国版《圣经》与白话本《圣经》篇名对照表	379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81

新撰论文

“拜上帝会”说再辨正	397
洪秀全登极暨金田起义时间考释	406
金田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	416
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	430
《罗尔纲全集》：20世纪史学的一座高峰和一面镜子	472
后 记	480
再版后记	484



引言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概述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1世纪诞生于巴勒斯坦，是犹太教与古希腊哲学的混合产物。《新旧约全书》是基督教的经典，又名《圣经》(Bible)，由《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简称《旧约》)和《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简称《新约》)两部分构成。《旧约》本是犹太教经典，原名《约书》，取义于书中讲到的上帝与犹太人^①在西乃山(旧译“西奈山”)下订立盟约这一情节。基督教沿袭了这一说法，认为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上帝已经与基督徒订立了新的盟约，因而将基督教形成后编写的经典称为《新约》，将犹太教原先的经典称为《旧约》。

基督教所信奉的神为上帝(God)。三位一体(Trinity)是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之一，即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三个位格：圣父(God the Father，上帝圣父)，圣子(God the Son，上帝圣子)，圣灵(God the Holy Ghost，上帝圣灵)。这三个位格相互区别，各有其理智和意志，能够各自活动，但在本性和实体上毫无差异。其中，上帝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属于纯灵，没有具体的形体。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并对人赏善罚恶。圣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指耶稣(Jesus)，在《新约》中又被称为基督或耶稣基督。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是上帝派遣到人世的救世主，为替世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升天，将来还会再度降临人间，对世人实施末日审判。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又称“上帝的

^① 犹太人(Jews)古称“希伯来人”(Hebrews)。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Abram)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徙到迦南定居，被当地人称作“希伯来人”，意即“来自大河那边的人”。另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雅各(Jacob，旧译“雅哥伯”)在返回迦南的途中，与天使摔跤获胜。天使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雅各从此便改名为以色列(Israel)。相传犹太人又叫以色列人即本此故事。

灵”，是上帝的化身。圣灵可以由上帝赐给人，降临到人的身上，使人拥有智慧、知识和谋略，以敬畏上帝为乐。传说马丽亚（Mary）便是通过圣灵怀孕而生下耶稣的。基督教持原罪说，宣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在伊甸园中受蛇的诱惑偷食禁果，这一罪过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源。按照这一理论，人因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从呱呱坠地之时起就是罪人，所以需要接受基督的救赎；只有依靠基督，人才能悔改和获救。基督教宣扬博爱、宽恕、忍耐、诚信等观念，声称善者将升入天堂享永福，恶者将沉沦地狱受永苦。

基督教诞生后，逐渐在处于奴隶制时代的罗马帝国境内流传开来，公元4世纪时被定为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基督教也随之分裂为东、西两大派。1054年，两派正式分裂。东部希腊语地区的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拉丁语地区的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中世纪时，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成为西欧各国封建统治的支柱，由罗马教皇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残酷镇压一切不满现状的“异端”人士，扼杀一切进步思想和言论。16世纪，随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天主教会内部发生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从中产生出一些脱离天主教的新的宗派，诸如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等，构成所谓的“新教”（Protestant）。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基督教最早于唐朝初期传入中国，时称“大秦景教”。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东正教系统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Alopen，7世纪）取道波斯（今伊朗），来到长安（今西安）译经传教。三年后，唐太宗准许景教在华传播，并下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景教从此逐渐在华传播开来。据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①记载，当时景教在华“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谓盛况空前。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唐武宗诏令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被波及，共有两千多名教士被逐，一时绝迹于中原。一部分教徒被迫迁徙到北方的蒙古等地。

元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又死灰复燃。时人将基督徒和教士统

^① 该碑于明朝天启年间出土，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



称为“也里可温”^①，基督教因此而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元代在华传播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一是流传于蒙古、中亚等地的景教，另一为罗马天主教。元世祖对各大宗教持兼容并包的态度，景教遂随着蒙古人南征的铁蹄卷土重来，并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盛况。当时，景教教堂分布大江南北，尤其以扬州、杭州、泉州等地为盛。稍后，罗马天主教也传入中国。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方济各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孟特戈维诺（Giovanni Montecorvino, 1247—1328）以教皇特使身份来到大都（今北京），朝觐元成宗，获准在京传教。他先后兴建两座教堂，为大约六千人洗礼，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大主教兼东方总主教；随后又在泉州建立了分教区。不过，在华的基督教两个教派因门户之见而摩擦不断，同时又都受到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这些因素便遏制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明末，天主教单独承担了在华传播基督教的使命。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殖民扩张，耶稣会（受葡萄牙控制）、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以上受西班牙控制）等修会相继派遣传教士来东方活动，其中以耶稣会最具影响。由于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均被迫滞留在广东近海的澳门或上川岛，无法涉足中国内陆。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从澳门潜入广东肇庆，揭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第三阶段的序幕。

为了缓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心理，打开在华的传教局面，利玛窦调整思路，积极适应中国的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他取汉名（号西泰），学汉语，改穿儒服，钻研儒家典籍，遵守儒家礼仪，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宣称儒家学说与天主教义有相近之处，中国古书中的“天”和“上帝”即西方所崇奉的“天主”，并引士大夫为奥援，贬斥敬奉偶像的佛教、道教；同时，广泛介绍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抵北京，向明神宗朱翊钧呈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天主像、《万国舆图》等物，获准长驻京城传教。利玛窦在北京盘桓近十年，病逝后被赐葬于京师阜成门外。

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利玛窦是以融合中西文化和介绍西方

^① 蒙古语，意为“有福缘之人”，语出《元典章》及元代的一些碑刻。又，因为基督徒崇敬十字架，所以当时基督教又被称为“十字教”。



科技的方式进行传教的第一人。经过利玛窦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天主教逐渐在华站稳了脚跟。当时，名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受洗入教。继利玛窦之后，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等后期来华的传教士也很受礼遇，获准在十三省中自由传教。明朝灭亡后，传教士继续受到礼遇。汤若望在1645年（清顺治二年）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修订历法；后来南怀仁也参与此事。清世祖还赐金一千两，在京城崇文门内兴建一座教堂，并亲书“钦崇天道”匾额。清世祖康熙年间，传教士分别参与绘制《皇舆全图》、修建圆明园，并充当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谈判的中方翻译。到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时，全国耶稣会教徒已有30万之众，就连云南、广西等偏远省份也设有教堂。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在心理上并不认同天主教，指斥天主教与圣人之学格格不入，诬惑民众，图谋不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和清康熙初年，士大夫们相继发难，掀起了两次反洋教风潮，致使不少传教士被逐或被系入狱，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因此而两度受挫。屋漏偏逢连夜雨。17世纪中叶，在华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又发生争执，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抨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的做法。从1700年起，这场礼仪之争逐渐升级为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冲突，双方互不相让。教皇决意禁止中国教徒沿袭中国礼仪，责令耶稣会改弦易辙。康熙则声明祭祖拜孔不带有宗教意蕴，下令将排斥中国习俗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后来又宣布严禁西洋人在华传教。于是，在华活跃一个多世纪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遂告沉寂。雍正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禁教政策。乾隆年间，清政府正式闭关自守。

附带说明的是，俄罗斯正教（东正教）也于清初传入中国。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雅克萨之役的俄国战俘被押解到北京。康熙下令把他们编为一佐领^①，并将城东北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划给其作为祈祷场所。二十余年后，彼得一世正式派遣俄罗斯正教传教团赴华。该传教团在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成为常设机构。由于当时俄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北京，加上两国之间的边境暂时比较安宁，因此，肇始于康熙年间的礼仪争执事件并没有波及俄罗斯正教。

^① 按照清代八旗兵制，每300人设一佐领。